大变局下中国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新发展*

孙吉胜

摘　要：语言是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元素。随着国际关系领域的“语言转向”，语言进入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议程，开启了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与语言的跨学科研究，国际政治语言学应运而生，并初步围绕语言在国际政治中的本体作用以及语言对国家行为、对外政策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促进了安全化、后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发展。近年来，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任务艰巨，大国博弈加剧，传统安全议题强势回归，“全球南方”崛起，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叙事之争、话语之争备受关注。这些新变化也产生了新叙事，更加凸显了语言的作用，促进了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新发展：学界更加重视对叙事、战略叙事的研究；安全化研究回潮，情感融入安全化等话语研究；学界更加关注话语对国际制度建设的影响；科技成为一个研究对象，也使新方法成为可能；围绕语言的国际政治研究同时呈现跨多学科的研究态势。这些新发展新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议程；未来也将继续推动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加深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国际政治语言学　话语　中国学派　国际话语权　跨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25)04–0021–23

作者简介：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博士，北京，100037

语言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进程与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关系领域随着“语言转向”的出现，语言正式进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视域，②开启了语言与国际政治的跨学科交叉

*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2022–2023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理论创新与国际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3ZDA126）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刘琼和黄琳为本文进行的一些资料收集和整理。

②　关于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参见孙吉胜：《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研究：以语言游戏为例》，载《外交评论》，2007年1期，第37–4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研究，产生了新的研究领域，即国际政治语言学。国际政治语言学如同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等一样，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分支。近年来，世界各领域出现了很多新变化，也遇到了很多新问题，需要人们去呈现、说明、阐释和理解，话语之争和叙事之争日益激烈，语言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具体而言，进入数字时代，信息传播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给信息生产、信息加工、信息传播等方面带来了深刻变革，需要重新审视语言的作用。同时，世界充满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对自身、对彼此、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认知和态度不断发生变化，不仅带来了对自身和彼此本体认识和本体安全的反思，对国际秩序如何演变也是众说纷纭。地缘竞争的加剧和传统安全的强势回归使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也经常体现在话语之争中。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新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日益追求独立性和自主权，追求自身话语影响力，希望以自己的理念和话语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变革和走向，“全球南方”的理念和话语备受关注。以上这些变化涉及语言的方方面面，需要深化研究，也使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议程不断拓宽和深化，推动了国际政治语言学的发展。本文旨在探讨国际政治语言学的最新发展及其原因，从而在学理层面上更好地通过语言来深入理解和认识国际政治，在政策层面上为如何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看待语言以及用好语言这一要素，如何构建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等提供一定的理论等指导。

一、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

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国际关系学科自1919年成立起一直保持着开放性和包容性，并在向其他学科借鉴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国际关系学界不断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借鉴核心概念和理论，在推进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同时，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认识和理解也更加全面深入。语言进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与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关系的巨变密不可分。在东西方对峙持续近四十年后，美苏关系缓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变化？如何看待国际秩序的演进？在对当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批评与质疑的过程中，语言作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元素进入学者的研究议程，开启了国际政治与语言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国际政治语言学应运而生。[①]学界围绕语言在以下方面进行了研究。

首先，关注语言的本体作用，分析语言如何建构身份、文化与社会现实。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主要受语言哲学对语言的认识影响。西方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家们从关注认识论和语言的工具功能转向语言的本体作用。随着语言哲学的诞生，人们开始更加强调语言与意义的关系，认为意义并非客观固定的，而是社会建构的，语言具有行事性和社会性，能够建构意义。正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语言的意义在于其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建构了各种语言游戏，语言游戏的规则就体现在语言游戏的实践中。[②]语言游戏规则限制了语言的边界，规则除了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外，还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观念。基于以上认知变化，围绕语言的本体意义，学界从语言角度对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很多理论反思和研究创新，产生了诸多成果。语言学的很多核心概念进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如言语行为、话语、隐喻、命名、语法、类比等。最有影响的是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Onuf）所发展的规则建构主义(rule constructivism)。该理论以言语行为为核心，认为语言的使用规则会演变为社会规则，即不同的言语行为建构了不同的规则，而规则是社会统治的基础，不同的规则汇聚成为不同形式的统治。正因如此，世界并非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时刻在被规则所统治。由于不同社会各类规则所占比重不同，有的社会是霸权统治，有的是等级统治，也有的是他治。[③]奥努夫也以此率先把建构主义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菲尔克（K.M. Fierke）等学者则从语言游戏角度进行了

① 孙吉胜：《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70–84页；孙吉胜：《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12–29页；孙吉胜、袁莎：《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源起、现状与前景——孙吉胜教授访谈》，载《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4期，第142–160页；参见孙吉胜主编：《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参见孙吉胜主编：《国际政治语言学：叙事、话语与国际话语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5年版。

② 王健平：《语言哲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171页。

③ 关于该理论，可参见Nicholas G.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the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o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美]尼古拉斯·奥努夫著，孙吉胜译：《我们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Vendulka Kubalkova, ed.,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 E. Sharp, 2001, pp. 5–1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理论探讨，并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很多具体案例进行了研究，凸显了语言的具体使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例如，她在反思冷战的结束时发现，在冷战结束前，苏联在社会层面针对美国的语言游戏已经发生了变化。她还针对具体的命名、隐喻、语法等如何影响国际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开启了很多新的研究议程。[①]贾尼丝·比埃里·马特恩（Jannice Bially Mattern）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发展的结构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更加强调语言的权力属性，认为语言是一种力量，具有结构性、差异性、关联性等内在特点，会塑造一种叙述结构，约束行为体的自我认同，影响其行为。她同时强调，身份是社会语言建构的结果，也需要通过语言来维持和发展，国际体系的结构不仅是一种社会建构，更是一种社会语言建构，也由此发展了后建构主义理论，[②]对建构主义进行了理论发展。

其次，在关注语言本体作用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语言如何影响国家行为，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国家行为一直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而对外政策是国家行为在国际层面的具体体现。针对语言的影响，很多成果以语言为研究核心，通过对话语、文本等的研究来揭示对外政策的本质。此类研究尤其以后结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为代表。例如，温都尔卡·库芭科娃（Vendulka Kubalkova）等学者运用建构主义理论，从语言等多方面分析外交政策，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家在社会建构的国际环境中，受历史、身份认同、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产物，并对冷战的结束、美国外交政策

① 参见K.M. Fierke, *Changing Games, Changing Strateg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K.M. Fierke, "Links across the Abyss: Language and Log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3. 2002, pp. 331–354；K.M. Fierke, "Multiple Identities, Interfacing Gam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Action in Bosn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4, No.2, 1996, pp.467–497; K.M. Fierke, "Dialogues of Manoeuvre and Entanglement: NATO, Russia and the CEECs," *Millennium*, Vol.28, No.3, 1998, pp.27–52; K.M. Fierke, "Besting the West: Russia's Machiavella Strategy,"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Vol.3, No.1, 1999, pp.403–434; K. M. Fierke and Antje Winer,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The EU and NATO,"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6, No.5, 1999, pp. 721–742; K.M. Fierke, "Logics of Force and Dialogue: The Iraq / UNSCOM Crisis as Social Constr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6, No.3, 2000, pp.467–497; K. M. Fierke and Michael and Nicholson,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ormal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Games," *Global Society*, Vol.15, No.1, 2001, pp.7–25；张飚：《卡琳·菲尔克的语言游戏建构主义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2期，第126–146页。

② 参见Janice Bially Mattern, *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y, Crisis,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中的伊斯兰教等案例进行分析。[①]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ell）在其《书写安全》中基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将身份、文化、话语和对外政策直接关联起来，将身份的概念进一步理论化，如通过对危险和差异的认知来确立自身以及与己对立的身份，为对外政策研究开启了新视域。[②]莱纳·汉森（Lene Hansen）则在《作为实践的安全》中从后结构主义理论出发，打破了身份影响政策的传统因果认知，提出身份与政策以话语为中介相互建构，对话语、身份、对外政策进行了理论探讨，为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分析对外政策文本和话语提供了理论指导。[③]再如，彼得·霍华德（Peter Howard）分析了为什么美国针对朝鲜和伊朗的核项目，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努力路径，并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从一开始就对两国开启了完全不同的游戏，[④]遵循了不同的行为逻辑，导致了不同结果。这些研究都充分显示出语言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也为如何深化此类研究提供了指导。

第三，以言语行为为核心，推动安全化理论的发展。安全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传统的安全研究主要关注军事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而随着对安全的认知变化，学界开始对传统安全研究进行反思和批判。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军事对抗相对减弱，而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些新的安全挑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推动了安全化研究的兴起。安全化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核心观点是安全威胁并非总是客观存在，而是通过言语行为建构而来，安全威胁被主观定义、建构和传播，最后形成一种主体间性认识。通过言语行为和话语实践过程，原本不是安全领域的议题可以被安全化，进入安全议程，使相关行为体采取相应的安全政策来应对。行为体通过安全化叙事塑造安全观念，形成紧迫性认识，突出威胁及威胁紧迫性，推动将其作为安全议题的讨论和政策制定。哥本哈根学派也正是基于其安全化

① 参见Vendulka Kubalkova, ed.,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E. Sharpe, 2001。

② 参见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③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p.18；[丹]琳娜·汉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概念和方法: 话语分析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89–109页。

④ Peter Howard, “Why Not Invade North Korea? Threats, Language Games,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8, No.4, 2004, pp.805–828.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产生了广泛学术影响。同样关注安全化的巴黎学派则注重社会文化等微观层面，运用社会学、文化研究等方法来研究安全问题，在分析中强调文化、话语等因素在社会层面的具体作用和影响。“气候变化”“艾滋病”“贫困”“外语能力”“5G”，甚至“人文交流”“孔子学院”都曾被不同程度安全化，体现了安全化理论的广泛影响。除了把本不是安全问题的议题安全化，通过言语行为和话语实践，安全化程度的高低同样可以通过话语来实现。例如，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气候变化”被高度安全化，而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气候变化”则逐渐被去安全化就是典型例子。安全化的高低直接影响了相关政策的推行。

第四，聚焦政治修辞研究，从修辞角度来研究对外政策。政治修辞强调政治行为体为实现特定政治目的，运用语言技巧对受众进行说服和引导，既是策略也是具体手段。政治修辞是国家向国际社会传达政策意图、争取支持的重要工具，在国际互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学界把修辞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和视角来研究，如国家如何通过政治修辞塑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使本国对外政策获得更广泛的理解与认同，对内实现政治动员，对外进行外交策略沟通，塑造国际形象等。有学者在研究中明确指出，政治修辞对于统治者来说极其重要。[①]伴随着以上对修辞的认识，对修辞的研究不断具体、细化。有学者指出，政治修辞不仅会影响政治进程与结果，有时还会产生修辞胁迫（rhetoric coercion）效果。[②]由于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人们就开始关注修辞，一些学者专门研究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政治修辞现象。[③]也有学者聚焦修辞的具体方面，例如，迈克尔·马克斯（Michael P. Marks）在其专著中从隐喻视角来看国际关系理论，专门考察了国际关系理论主要范式中的隐喻表达，如现实主义的权力隐喻、安全隐喻、博弈论隐喻等，强调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大多数术语、概念和分析工具在本质上都具有隐喻性质，隐喻是了解和认识国际事务领域的政治家和

① John Kane, Haig Patapan, “The Artless Art: Leadership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tic Rhetoric,”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5, No.3, 2010, pp.371–389.

② Ronald R. Krebs,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Twisting Tongues and Twisting Arms: The Power of Political Rhetoric,”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3, No.1, 2007, pp.35–66.

③ 参见D J. Kapust Republicanism, *Rhetoric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Sallust, Livy, and Tacitu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决策者界定问题和制定政策的参考因素之一。[①]还有学者从隐喻和叙事的角度来研究言辞之战，展示了修辞对国际政治话语以及国家、主权、国际关系和冲突理论的影响。[②]另一方面，因为修辞与政治实践密切关联，很多学者聚焦行为体在实践中的具体修辞运用，研究修辞对具体政策的影响，尤其是研究国家领导人的具体政治修辞。例如，系统研究尼克松、撒切尔、胡佛、罗斯福、肯尼迪等的修辞策略，以揭示他们的政治修辞如何影响国内国际政局，如何应对危机，如何塑造总统形象，引导公众舆论，以及如何推动政策实施，[③]有研究专门将此类研究称为总统修辞学。[④]这些研究也使政治修辞分析成为观察国际关系具体实践的一个重要路径。

第五，广泛借鉴和发展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化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相比，语言学历史悠久，分支细化，既有语义学、语用学、音位学等划分，也有针对不同领域的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有学者强调所谓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互动，是反映和产生特定背景的文本。[⑤]一些基础的语言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也被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如文本分析、语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修辞分析、词汇计量分析、叙事分析等，以更好地揭示国际关系的变化过程和结果，如身份的产生、特定意义的建构等。语言学研究通过建立语料库，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具体词语、语法、文本结构等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也经常被使用，以显示行为体的行为和国家政策背后的原因、规律和演变。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学者在此类研究方法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突破，例如，汉森对如何通过话语分析来理解国

① 参见Michael P. Marks, *Metaph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1；[美]迈克尔·马克斯著，石毅译：《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隐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② 参见Michael Hanne, William D. Crano, Jeffery Scott Mio, eds., *Warring with Words: Narrative and Metaphor in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Psychology Press, 2014。

③ 参见Davis W. Houck, *Rhetoric as Currency Hoover: Roosevel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drew S. Crines, Timothy Heppell, Peter Dorey, *The Political Rhetoric and Oratory of Margaret Thatcher*,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2016；岳圣淞：《情境、身份与对外政策：政治修辞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版。

④ 参见Theodore O. Windt, Jr., *Presidents and Protesters: Political Rhetoric in the 1960s*,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0。

⑤ Luísa Godinho, “Discours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Janus. Net: 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7, No.2, 2016–2017, pp.1–13.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家对外政策、国际安全等创新了研究方法，在研究身份、话语、对外政策时不仅扩大了政治分析的文本范围，把分析文本从国家领导人讲话等政治文本拓展至游记、文学作品等更广的范围，还把互文性引入到分析中，其专著系统分析了美国克林顿政府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的具体政策，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①]林瑞谷（Erik Ringmar）从互文性角度分析了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不同叙事，把不同叙事的争论和联盟解释为是互文性问题。[②] 此外，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经常被用来揭示话语、权力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话语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等，也经常被用来分析国际关系实践。在聚焦国际实践的理论中，有学者指出实践将话语世界与物质世界编织在一起，话语实践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言语行动，因此需要将话语视为实践，也需要将实践视为话语。[③]基于实践理论，有学者指出后结构主义分析关注“过于静止、稳定和一致”的内容，而没有关注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的转变、变化和不稳定性，进而把传统的后结构主义文本分析方法与“实践行动”分析相结合，拓展了进一步分析“文本”和“做事”的空间。[④]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结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二、大变局下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与语言作用的凸显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关系领域发生诸多变化，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挑战，使人们在观察和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时增加了很多疑问和不确定性。国际力量对比不断调整，大国博弈加剧，关于国际秩序走向的各种叙事各执一端。科技变革使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变革，国际传播进入人机共生的全球传播时代，关于生成性人工智能的潜在影响还远没有确切答案。“全球南方”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战略力量，其独立性和自主性日益增

① 参见Lene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② Erik Ringmar, “Inter-Textual Relations: The Quarrel Over the Iraq War as a Conflict between Narrative Types,” *Cooperation & Conflict*, Vol.41, No.4, 2006, pp.403–421.

③ [加]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等主编，秦亚青、孙吉胜、魏玲等译：《国际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④ [丹]莱纳·汉森：《实施实践：穆罕默德漫画危机的后结构主义分析》，载[加]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等主编，秦亚青、孙吉胜、魏玲等译：《国际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338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强，希望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其集体影响能够发挥到何种程度还是未知数。如何来表象和理解这些新变化、新挑战、新认识实际都与语言密切相关，这些变化使以语言为媒介的表象和针对语言的理解变得更加重要，也使国际政治中围绕语言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

首先，国际关系近年来出现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加凸显了叙事的作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国际体系经历复杂变化和深刻调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面临分裂分化风险。国际秩序的演变举世关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导致认知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差距也在不断变化。世界力量重心从欧美向亚太转移。以上这些物质力量变化影响了各国对自身、对彼此的认知和态度，也带来了一些认知和叙事领域的混乱甚至无序，各国互信缺失，不时对自己的本体安全产生诸多疑问甚至焦虑。随着中美、美俄、俄欧关系的变化，大国博弈日益增强，地缘政治强势回归，这些竞争和博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很多也体现在话语层面。乌克兰危机以来，各方在进行热战的同时也在进行认知战、心理战、叙事战和舆论战。与此同时，面对各类全球性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已经无法维系世界的稳定，也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新冠疫情的暴发尤其暴露出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系列问题。人们不时用全球秩序的崩塌或是终结来描述当前的国际秩序。面对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各种思潮迭起，碰撞不断。过去人们对一些问题所持的基本共识日益受到侵蚀，甚至被否定。例如，过去人们基本认同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使数亿人摆脱贫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这些基本共识不断被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所侵蚀，自由贸易不时受到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冲击，诸如英国“脱欧”这样的事实也使人们从最初的震惊转变为习以为常，对区域一体化不再坚信不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不时受到挑战，多边主义国际机制的基本运行不断受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规范不时被践踏和违背。有研究指出，当叙事情境面临不确定性时，讲故事的作用越发重要，也很容易产生建构效果。[①]例如“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所讲述的

① Ronald R. Krebs, *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6–39.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反恐故事使美国成功实现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反恐动员，对美国政治甚至对国际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面临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叙事来获得秩序感和意义，也迫切需要在无序中建立一种安全感。如何来解释和理解诸多变化以及未来的演变态势，如何预测未来，如何使自己的政策和行动获得合法性和国内国际支持，这些都与语言的使用密切相关。国家、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媒体甚至是有国际影响力的个人等不同行为体围绕国际秩序、国际体系等重要方面在不断进行叙事之争，而哪种叙事能够成为主导叙事则会直接塑造人们的认知，也关乎相关政策的走向，甚至会被客观化为知识，从而影响国际关系的走向，也成为国际话语权的体现。

其次，各类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全球治理任务日益艰巨，人类的认知边界和知识边界不断被打破，需应对的治理盲区不断增多，需要更多知识供给与知识传播。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应运而生。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 Annan）在其“千年演讲”中强调了新世纪世界面临的各类全球性问题以及全球合作应对的重要性，使全球治理在政策层面备受关注。近年来，在一些传统治理领域，人们的认知在不断被刷新。人类再次意识到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及其外溢效应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气候变化使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未来状况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对生物多样性将造成哪些不可逆转的影响更没有确切答案。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活动边界日益拓展，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诸多新板块，网络、太空、深海、极地、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为全球治理增加了很多新任务新疑问。人工智能未来会对人类安全和发展带来哪些影响？生物科技将使人类发生哪些变化？很多全球性问题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边界，暴露出诸多认知盲区和治理盲区，也带来了更多认知领域的知识鸿沟。如何表象、框定、讲述这些问题本身、原因、影响及其未来的挑战又与对其使用的具体语言密切相关。语言决定了人的认知边界，人类所共有的知识也需要依赖语言的表象进行生产和传播。实际上，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同样存在话语和话语权的竞争。对具体全球性问题的不同表象方式、所传播的各类知识可以构建不同的叙事，而这些又会直接影响实际政策。

再次，科技变革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国际传播的作用更加凸显。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类进入了以智能化为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重要变革。科技变革带来的语言使用和信息生产方式以及传播模式的变化，很多是借助语言来完成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大大改善，使信息传播从过去人们所依赖的报纸、收音机、电视拓展至各类网络社交平台，智能手机成为人们日常所依赖的主要信息获取和传播渠道，信息传播从传统的单向传播转变为交往式或交互性传播。不仅如此，传播信息量、传播速度、传播渠道、传播主体等都在发生变化，信息生产和传播主体更加多元，科技赋能个体，使个人拥有了生产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机会和条件。人们通过社交平台，不仅在传播和接收信息，同时也在通过点赞、弹幕、留言讨论等方式进行交往，交往和交互过程成为塑造和影响个人认知和社会舆论的重要方面。各类人工智能平台的使用还凸显了各类数据的重要性，什么样的话语可以进入二次传播甚至多次传播过程本身也是话语权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生产和传播领域的巨大变革，科技在为国际传播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虚假信息，如深度造假视频等。乌克兰危机暴发后，人们每天在关注热战的同时，也在讨论信息战、舆论战和认知战。各种虚假信息充斥着国际舆论场，虚假信息的生产和操控者不仅可以通过虚假信息影响世界舆论、塑造认知，甚至可以干扰和影响决策。这些新变化也使应对虚假信息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新议题和新风险。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第20版《全球风险报告》，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连续两年位居短期风险之首，持续对社会凝聚力和治理构成重大威胁。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叙事、情感、道德、伦理等因素与人们的感知、理解、心理等因素密切关联，使各国的理念、政策、话语、叙事等的塑造、传播、投射和接受过程更加复杂，相关治理更是任重道远。

最后，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其话语体系建设和追求话语权的实践受到更多关注。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全球南方”国家因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备受关注。2022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就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进行投票表决，反对和弃权票达到83个，“全球南方”立场被热议。“全球南方”概念由此在国际政治中不断升温，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词。尽管“全球南方”包含国家众多，在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自然资源等物质条件方面大不相同，在意识形态、社会宗教、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等方面也相差巨大，各国诉求和关切重点千差万别，但在实践中，“全球南方”作为一个群体日益体现出自主性和独立性。[①]“全球南方”也形成了一些共同话语，如批评当前西方大国

① 孙吉胜：《“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及前景》，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7期，第38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及其经常出现的双重标准，希望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平衡的方向发展，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清晰度和民主性，希望国际秩序能够更加体现公平正义，更加具有包容性，更体现“全球南方”的利益和诉求。“全球南方”如果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影响力，还需要在一些重要方面达成更多共识，塑造更多共同叙事和共同话语，使世界能够听清南方国家的理念、主张和政策，不断提升南方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如代表权、发言权、定义权、解释权、说明权、裁判权等，尤其是制度性话语权。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在以上方面做了诸多努力，南方各国的话语及其背后的理念、主张和政策等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2024年11月在巴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就以“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为主题，聚焦抗击饥饿与贫困、可持续发展及全球治理机构改革等议题，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主张和关切。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也强调要加强构建中国叙事和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不断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和国际话语权。在国际层面，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中国话语都备受关注。

三、中国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新发展

以上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的新变化成为国际政治语言学不断发展的时代基础和推动力。这些变化更加凸显了语言的重要性，拓展了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议程，推动了国际政治语言学的以下新发展，未来也需要学界持续跟踪和深入研究。

第一，叙事被认为是塑造和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持续被关注。叙事主要强调通过一定的逻辑结构和情节安排，讲述一个故事或传达一系列信息，把原本没有关联的现象和元素围绕某种因果关系或情节联系起来，向人们展示事件、情节、场景、人物及其影响等。在国际关系中，叙事分析可以揭示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如何运用叙事来构建和传播国际形象、政策立场和历史记忆等及其如何影响相关行为。叙事被认为是各国建构身份、政治动员、引导政策、塑造秩序的有力途径和手段，也是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的重要元素。对叙事的研究是国际政治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很多研究从叙事角度研究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政策。美国学者罗纳德·克雷布斯（Ronald R. Krebs）在其专著《叙事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建构》中，从叙事入手，分析了从罗斯福总统到奥巴马总统分别如何讲述美国的安全故事，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系统阐述了叙事对安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为何有的安全叙事成功，而有的不成功。[①]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地区冲突、难民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日益凸显推动了本体安全研究的蓬勃发展。许多研究从叙事角度审视本体安全及本体不安全，使国际安全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本体安全主要强调行为体，如国家、民族、国际组织等在身份认同、存在意义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安全需求与稳定，这些与语言直接关联。有的研究从叙事和本体安全角度解释欧洲的移民危机，揭示了叙事如何帮助行为体管理焦虑以维持本体安全。[②]有的学者从外交话语的角度研究本体安全，[③]有的学者从俄罗斯本体安全角度研究乌克兰危机，认为本体安全是分析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④]也有学者研究本体安全、本体焦虑等因素对欧盟外交政策及欧盟一体化的重要性，强调要从欧盟叙事来理解其对具体事件的反应和政策。[⑤]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影响本体安全的要素以及具体政策影响。

近年来，叙事研究提出了很多新概念，如叙事力、[⑥]叙事政治、[⑦]集体叙事、[⑧]叙事联盟[⑨]等，体现了叙事的不同方面对国际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叙事冲突是各国关系的一个体现，如瑞典和挪威参与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行动面临和平国家叙事与军事行动现实之间的紧张，

① 参见Ronald R. Krebs, *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C. Nicolai L.Gellwitzki, Anne-Marie Houde, “Narratives,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Unconscious Phantasy: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Myth During the so-called Migration Cri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44, No.2, 2023, pp.435–451.

③ Luciano da Rosa Muñoz, “Brazilian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s and the Quest for Ontological Security,” *Contexto Internacional*, Vol.45, No.2, 2023, pp.1–21.

④ Katie Ryan, “Russia’s Search for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Ukraine Invasion,”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15, No.1, 2023, pp.82–93.

⑤ Lauren Rogers, “It’s not EU, It’S We: Ontological Stress and French Narration of the Uprisings in Tunisia,” *European Security*, July 2024 (Ahead of print), pp.1–19.

⑥ Linus Hagström and Karl Gustafsson, “Narrative Power: How Storytelling Shapes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2, No.4, 2019, pp.387–406.

⑦ 参见Alexandra Homolar, *The Uncertainty Doctrine: Narrative Politics and US Hard Power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⑧ 参见Ana-Maria Bliuc and Alexander Chidley, “From Cooperation to Conflict: The Role of Collective Narratives in Shaping Group Behaviour,”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Vol.16, No.7, 2022。

⑨ 参见Alexandra Homolar, Oliver Turner, “Narrative Alliances: The Discursiv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1, pp.203–22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导致其传统和平叙事与新兴军事文化叙事之间的话语冲突与斗争，对两国自我认知和政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①]有研究指出，国家间集体叙事可以为建立和维护友好关系提供软实力资源，对国际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尤为重要。[②]也有研究聚焦叙事联盟，认为国际秩序的叙事基础被长期忽略，叙事联盟介于话语共同体和话语联盟之间，强调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需要构建叙事联盟，以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协调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影响。[③]此外，讲故事作为叙事的一种方式，也引起了学界关注。讲故事不仅被视为一种文体上的选择，还被认为对于所产生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各个主题都具有政治意义。[④]有学者从讲故事角度来研究在国际原住民气候变化论坛上原住民发言者如何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周旋，并通过讲故事来构建跨国团结网络，通过“韧性修辞”（resilience rhetorics）的集合来构建国际联盟。[⑤]叙事联盟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联盟同样会塑造认知，影响政策走向。

第二，对战略叙事日益重视，凸显战略叙事的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的增强和世界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很多学者聚焦战略叙事。战略叙事与一般叙事相比，是一个国家、组织或团体为实现特定战略目标，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构建和传播故事、话语及理念，来塑造认知、引导舆论、凝聚共识与影响行为的一种战略传播手段。政治行为体可以通过战略叙事构建关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一个共享意义，进而影响和塑造国内和国际行为体的行为。[⑥]战略叙事被视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话语武器，决策者可以通过

① Roxanna Sjöstedt and Erik Noreen, “When Peace Nations Go to War: Examining the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Sweden and Norway in Afghanista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6, No.3, 2021, pp.318–337.

② Tracy Adams, Gadi Heimann and Zohar Kamp, “How Do States Reminisce? Building Relations Through Bonding Narrativ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59, No.1, 2024, pp.47–65.

③ Alexandra Homolar, Oliver Turner, “Narrative Alliances: The Discursiv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1, 2024, pp.203–220.

④ Megan Daigle, “Writing the Lives of Others: Storytelling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illennium*, Vol.45, No.1, 2016, pp.25–42.

⑤ Jessica Chaplain, “Storytelling and Worldmaking Climate Justice Futures: Indigenous Climate Advocacy an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in UN Climate Conferen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110, No.3, 2024, pp.370–395.

⑥ 关于战略叙事，可参见Alister Miskimmon, Ben O’Loughlin, Laura Roselle, *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aylor & Francis: Routledge, 2013; Alister Miskimmon, Ben O’Loughlin, Laura Roselle, *Forging the World: Strategic Narrativ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7。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策略性地生成和投射战略叙事，塑造对外政策合法性。阿利斯特·米斯基蒙（Alister Miskimmon）等学者围绕战略叙事产出了系列代表性成果，[①]也带动了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

近年来，围绕战略叙事的研究不断细化。一方面，学界更加关注各国和重要国际组织的战略叙事，相关研究充分体现区域国别特征。叙事一直是国家发挥施动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不同国家的战略叙事，尤其是大国叙事，不仅影响自身，也会影响国际秩序的方方面面。例如，关于俄罗斯的战略叙事研究涉及不同方面。有学者认为研究俄罗斯如何以及为何构建并维系其战略叙事是理解和解读俄罗斯宣传的一个关键途径。[②]有研究聚焦俄罗斯2022—2023年的战略叙事，指出俄罗斯在与西方争夺主导话语权的过程中，其战略叙事勾勒出俄罗斯政府的政治目标及其对新世界秩序的构想。[③]也有研究聚焦俄罗斯乌克兰叙事及乌克兰危机中的战略叙事[④]与5G叙事[⑤]等。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研究在涉及中国话语时多次使用“战略叙事”这一表述，认为中国具有自己的战略叙事，并进行了很多相关研究。有学者强调了中国使用战略叙事的重要性，并探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如何利用战略叙事来缓解霸权国的担忧。在亚洲地区，中国通过战略叙事降低地缘政治成本，以经济手段建立影响力，向世界传达遵守现有规则、寻求有限变化的意愿，同时确保其他国家参与中国倡议的安全。[⑥]学界也非常关注中国在全球难点与热点

① 参见Alister Miskimmon, Ben O’Loughlin, Laura Roselle, *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aylor & Francis: Routledge, 2013; Alister Miskimmon, Ben O’Loughlin, Laura Roselle, *Forging the World: Strategic Narrativ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7。

② Sarah Oates and Sean Steiner, “Projecting Power: Understanding Russian Strategic Narrative,”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229, 2018, pp.2–5.

③ Olena Snigyr, “Russian Strategic Narratives, 2022–2023,” *Orbis*, Vol.68, No.1, 2024, pp.3–23.

④ Kateřina Fridrichová, “Mugged by Reality: Russia’s Strategic Narratives and the War in Ukraine,”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39, No.3, 2023, pp.281–295; Juris Pupcenoks, Eric James Seltzer, “Russian Strategic Narratives on R2P in the ‘Near Abroad’,”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49, No. 4, 2021, pp. 757–775; Samantha Bradshaw, Mona Elswah, Monzima Haque, Dorian Quelle, “Strategic Storytelling: Russian State-Backed Media Coverage of the Ukraine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36, No.3, 2024, pp.1–11.

⑤ Sten Hansson, Mari-Liis Madisson, Andreas Ventsel, “Discourses of Blame in Strategic Narratives: the Case of Russia’s 5G stories,” *European Security*, Vol.32, No.1, 2023, pp.62–84.

⑥ Alex Yu-Ting Lin, Saori N. Katada, “Manufacturing Consensus: China’s Strategic Narratives and Geoeconomic Competition in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0, No.3, 2024, pp.725–755.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问题中的叙事及影响，如中国针对乌克兰危机的叙事等。[①]“一带一路”倡议也掀起了国外学者关注中国战略叙事的高潮。不少学者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有的从历史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叙事；[②]有的研究不同国家如何对中国“一带一路”叙事进行选择性使用，以为本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提供支撑；[③]有的研究中国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叙事，向参与国家展示互利共赢的发展前景，使中国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塑造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力；[④]也有学者在研究“一带一路”叙事时聚焦视觉和数字基础设施，突出了数字时代的传播特点。[⑤]这些研究也体现出学界对“一带一路”话语和具体实践的重视。

在关注大国战略叙事的同时，一些研究聚焦国际组织，如欧盟的战略叙事、[⑥]金砖国家的战略叙事。[⑦]学界也开始关注小国以及区域国家集体的战略叙事，认为话语一直是非西方国家发挥施动性的主要工具和体现。在小国与大国的博弈中，话语和叙事被证明是一种有力的策略。例如，有学者分析实力较弱的国家如何创建和部署自己的战略叙事，以试图影响实力较强的国家。[⑧]有学者鉴于土耳其作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专门将其叙事作为研究

① Xuechen Chen, “Strategic Narratives of Russia’s War in Ukraine: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Policy Studies*, Vol.45, No.3/4, 2024, pp.573–594.

② Carolijn van Noort, “Strategic Narratives of the Past: An Analysis of China’s New Silk Road Communication,” *Globa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4, No.2, 2020, pp.186–205.

③ Carolijn van Noort, Thomas Colley, “How Do Strategic Narratives Shape Policy Adoption? Responses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1, 2021, pp.39–63.

④ Tabita Rosendal, “China’s Buddhist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Sri Lanka — Benefits and Buddhism?” *The Pacific Review*, Vol.36, No.6, 2023, pp.1426–1455；汪恒、陈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叙事的三重构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载《国际展望》，2023年第5期，第36–54页。

⑤ Carolijn van Noort, “Strategic Narratives, Visuality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ase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3, No.5, 2020, pp.734–751.

⑥ Ramos, Paulo, Vieira, Alena, “European Union, Russia and the MH17 Case: Strategic Narratives’ Analysis (2014–2019),” *Janus.Net: 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0, No.2, Nov. 2019–Apr. 2020, pp.53–67.

⑦ Carolijn van Noor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in the Strategic Narratives of the BRICS,” *Globa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3, No.4, 2019, pp.462–478.

⑧ Joanne Wallis, Maima Koro and Corey O’Dwyer, “The ‘Blue Pacific’ Strategic Narrative: Rhetorical Action, Acceptance, Entrapment, and Appropri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37, No.2. 2023, pp.1–22.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重点。[①]以上都体现出战略叙事研究的区域国别特征。

第三，从话语角度研究国际制度，更好地理解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建设与演进。任何规范及规则的形成和社会化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完成，而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并非固定不变，一些新的制度安排也可能产生出新的规则规范，进而影响国家和地区行为，影响全球治理甚至国际秩序的演进，在当前国际秩序经历深刻变革时更是如此。在区域层面，话语是构建共识、形成共享理解和预期的关键。有研究从该角度来研究欧盟，如针对欧盟国家的援助规则，不同成员国在应用共同规则时展现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话语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共识形成的体现。[②]与此类似，以东盟为代表的规范力量一直是学界的一个关注点，“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引起越来越多围绕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讨论，如东盟的话语叙事、理念规范等。[③]再如，澜湄合作近年来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有学者通过研究澜湄合作框架，指出中国通过话语和理念的力量，不仅推动了区域合作的制度化，促进了区域规范的生成与发展，而且通过策略性叙事和说服，塑造了目标国家的利益感知，也维护了自身利益。[④]此外，对于规则规范而言，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跟随者，而非塑造者。这种状况也在逐渐改变，发展中国家日益贡献出很多新理念新规范。这首先体现在话语层面。例如，有研究指出，通过战略叙事和政策推广，中国的发展经验正在激励更多理念相似的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⑤]在人权领域，有研究指出中国通过在联合国推动新的人权概念，

① Umut Can Adısönmez, Recep, Onursal,“Strong, but Anxious State: The Fantastic Narratives on Ontological Insecurity and Anxiety in Turkey,” *Uluslararasi Iliskil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73, 2022, pp.62–75; Ozlem Kayhan Pusane, Asli Ilgit, “Ontological Insecurity, Anxiety, and Hubris: An Affective Account of Turkey-KRG Relations,” *Uluslararasi Iliskil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73, 2022, pp.95–111.

② Bernard Steunenberg and Pieter Zwaan, “Working with the EU: How Discourses Shape the Application of EU State Aid Rules,”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62, No.1, 2024, pp.242–261.

③ Anna Grzywacz,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Narratives of Non-compliance with Norms: Shaming and Escaping a Narrative Trap,” Media, War & Conflict, Vol.16, No.2, 2021, pp.173–191; Linus Hagström Karl Gustafsson, “Narrative Power: How Storytelling Shapes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0, No.4, 2019, pp.387–406.

④ Gong Xue and Li Mingjiang, “Taking Ideas and Words Seriously: Explain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24, No.2, 2024, pp.253–287.

⑤ Amjed Rasheed, “The Narrative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Case of Egypt,”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57, No.2, 2022, pp.68–8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强调国家主权和发展优先于个人权利，在以制度性、结构性和生产性权力重塑全球人权话语。[①]各国利用话语不但可以重塑国际规范，还可以将其转化为国内政策，并在国际社会推广其政策议程。例如，瑞典、加拿大、法国和墨西哥四国通过战略叙事将国际女权主义规范转化为各自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增强了自身软实力。[②]此类研究也体现出话语对塑造规则、规范以及后续政策的影响。

第四，安全化研究的回潮和细化。近年来，国际安全领域震荡不断，地缘竞争日益激烈，传统安全议题强势回归，大国博弈加剧，对安全研究产生了影响。很多原本不是安全领域的议题被高度安全化，带动了安全化研究的回潮，安全化研究日益细化，安全化理论不断发展。一方面，学界对一些由来已久的安全问题持续关注。例如，有研究从个人角度研究安全化，对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对朝鲜（去）安全化的偏好分别进行了研究，指出克林顿尝试对朝鲜去安全化，改善了美朝关系，而小布什则努力对朝鲜进行再安全化，从而逆转了克林顿时期美朝关系的进展。[③]近年来，围绕公共卫生问题产生了不少关于安全化的研究。[④]有学者指出，一些关于全球卫生领域的讨论经常向卫生安全和生物医学问题倾斜，卫生问题在外交政策中被进一步安全化，这成为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一个特点。[⑤]同时，学界不仅关注安全化，还针对去安全化与反安全化[⑥]、过安全化与泛安全化等领域进行研究，以揭示不同领域安全政策本质。例如，有学者指出了公共卫生过安全化问题，强调众多

① Malin Oud, “Powers of Persuasion? China’s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Discourse Power at the UN,” *Global Policy*, Vol.15, No.S2, 2024, pp.85–96.

② Ekatherina Zhukova, Malena Rosén Sundström and Ole Elgström,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FFPs) as Strategic Narratives: Norm Translation in Sweden, Canada, France, and Mexic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8, No.1, 2022, pp.195–216.

③ Alexander Schotthöfer, “Individuals in Securitization: Explaining US Presidents’ Choice to (De) Securitize North Kore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20, No.3, 2024, pp.1–21.

④ 魏志江、郑宇晴：《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中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模式论析》，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第134–156页。

⑤ Jens Holst, “The Biomedical Securitization of Global Health,” *Globalization & Health*, Vol.19, No.1, 2023, pp.1–9.

⑥ Hazal Muslu, El Berni, “The Negotiated Desecuritization of Turkey in Saudi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Policy*, Vol.30, No.2, 2023, pp.62–74; Ian Paterson, Georgios Karyotis, “‘We are, by Nature, a Tolerant People’: Securitization and counter-securitization in UK migratio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6, No.1, 2022, pp.104–12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健康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被构建为对卫生安全的威胁，健康问题安全化已超越了一种修辞手段，安全部门直接参与，卫生安全的执行本身已成为一种安全威胁，这些因素改变了全球卫生安全叙事的范畴。[①]有学者研究了欧盟的公共卫生政策，指出近年来部分欧盟机构强化了“卫生安全”，表明欧盟的全球卫生行动理念向不那么利他的方向转变。[②]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变化以及大国竞争的加剧，国际关系中的泛安全化态势加剧，不少研究开始关注泛安全化及其对具体领域政策的影响。[③]此外，随着信息呈现和传播的多模态化，对于安全化路径的研究也更加丰富，从过去单纯研究言语行为，转向视觉语言，出现了针对图文结合、静态图像到动态图像的拓展，更加突出了图像语言的即时性、意象性、无边界性，安全化效果更容易实现。汉森等学者在国际关系的视觉化和美学转向等领域产出了不少代表性成果，也凸显了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和认知建构特性。

此外，情感更多被融入安全化研究。由于安全的主观和感知特性，对安全的感知经常涉及情感，因此情感成为安全和安全化研究中的重要元素。情感经常涉及同情、愤慨、焦虑、恐惧、幸灾乐祸等，不仅是个人体验，也是集体行动和政治运动的催化剂，既可以影响个体决策和行为，也会在社会层面引发广泛共鸣。情感既可以强化既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以维护现状，也可以促进社会变革。有学者基于现有关于情绪和话语的研究，探讨情绪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构建。[④]具体到安全化过程中，情感在传播恐惧和焦虑、强化威胁感知、动员公共支持、设定政策优先级以及塑造政策话语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很多研究把话语、叙事与情感相结合。例如，有学者通过研究阿塞拜疆能源安全政策展示了情感如何成为推动政策行动和社

① Clare Wenham, “The Oversecuritization of Global Health: Changing the Terms of Deb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5, No.5, 2019, pp.1093–1110.

② Óscar Fernández,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isation of Global Health: Was COVID-19 a Zeitenwende?” *European Security*, Vol.33, No.3, 2024, pp.449–473.

③ 叶海林：《泛安全化背景下的国际信任缺失与重构》，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4期，第89–101页；刘建超：《破解“泛安全化”困境　携手维护国际共同安全》，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4期，第4–6页；卢凌宇、崔磊：《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载《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3期，第76–97页。

④ Manuel Alcntara-Pla, “Understanding Emotions in Hate Speech: A Methodology for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Vol.35, No.4, 2024, pp.417–433.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会动员的关键力量。[①]情感还可以影响受众对相关话语的理解和反应。有研究指出，在国际人权法的背景下，气候变化话语中的恐惧修辞，虽然能引起关注和激励行动，但也可能导致公众的疏离和对气候政策的反对。这表明情感话语不仅是科学事实的反映，也是塑造认知的一种特殊情感修辞。

第五，聚焦科学技术的研究以及科技对话语研究的影响。数字时代，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变革对语言及语言的应用产生了深远影响，话语的生成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媒体的兴起，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普及，为话语研究开辟了全新方向和平台，也使相关研究不断细化，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议程。科技领域一直是大国博弈和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因素，科技领域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例如，近年来，5G的发展备受关注，也成为西方国家安全建构的重要对象。有学者指出俄罗斯通过责备话语来描绘美国在5G问题上的无端指责、虚伪行为以及对盟友的压力，同时构建中国作为技术先进受害者的形象，反映了俄罗斯对西方政策的批评，展示了推动多极世界秩序的愿景。[②]此外，新媒体平台的多样化为政治话语的传播提供了新渠道，一些研究对此高度关注。有学者通过研究国家领导人的社交媒体话语发现，西方国家领导人倾向于利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自我宣传和舆论引导，反映了新媒体在塑造政治话语和公共舆论方面的强大潜力。[③]此外，虚假信息不仅成为安全研究的热点话题，也成为话语研究的一个新关注点，虚假信息作为数字时代信息操控的重要手段，可以误导公共舆论，干扰话语环境，已成为一种复合型国家安全威胁。[④]除了研究内容，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发展也为分析海量数据和话语模式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方法，大语言模型可以基于对相关语言的收集更好地完成概念辨析、话语分析、理论构建等具体任务，也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挖掘政治文献、社交媒体内容、演讲和辩论记录，更好地揭示政治话语的深层模式和趋势。这些新技术新手段正在并将继续推动国际政治语言学围绕语言和话语的

① Aurora Ganz, “Emotions and Securitisation: A New Materialist Discourse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0, No.2, 2023, pp.280–305.

② Sten Hansson, Mari-Liis Madisson and Andreas Ventsel, “Discourses of Blame in strategic Narratives: the Case of Russia’s 5G stories,” *European Security*, Vol.32, No.1, 2023, pp.62–84.

③ Sonia Madrid Cánovas, “Análisis del personalismo en el discurso político en redes: el perfil de Macron en Instagram,” *Círculo de Lingüística Aplicada a la Comunicación*, Vol.96, 2023, pp.303–318.

④ 袁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虚假信息研究》，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第32–56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研究。

第六，跨科研究日益深入、多样，理论研究视角不断创新，多学科研究态势涌现。国际政治语言学本身就是国际政治与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结果。而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已经不仅在国际政治和语言学这两个学科之间进行，一些研究不时借鉴其他学科，出现了跨多学科的研究态势。一些研究基于国际政治学科，越来越多地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等临界学科和领域结合，而技术进步也有力促进了人文学科与技术学科的融合，不少研究采用多学科方法来探究国际政治的语言、话语与叙事。例如，有学者将哥特式艺术风格应用于叙利亚战争的图像研究，探索图像如何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深层联想。[①]在研究情感叙事时，经常涉及心理学、政治学和语言学的知识和理论。例如，有学者在研究土耳其政党时认为土耳其利用民众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怀旧情绪进行情感动员，为研究国家叙事提供了借鉴。[②]还有研究借鉴金融学的知识来研究国际争端，认为金融学的通胀概念与叙事、情感和社会互动，加剧了相关行为体的安全困境和地位困境。[③]实际上，通过多学科借鉴，国际政治语言学针对话语的研究边界在不断拓展，也对国际政治中的诸多现象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四、结　语

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与国际秩序及国际体系的演变密切相关，国际关系中的新发展、新变化、新事件一直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的经验基础，不断激励和推动研究创新。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向其他学科借鉴核心概念、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不断拓展研究边界和理论边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认知也因此更加深刻。20世纪80年代末，语言进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视域，也催生了国际政

① Frederic Carl Windfeld, Marius Hauge Hvithamar and Lene Hansen, “Gothic visibi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canny Icons, Critical Comics, and the Politics of Abjection in Alepp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50, No.1, 2024, pp.1–34.

② Michalis Theodorou,“Aspects of Populism and Nostalgia in the AKP’s Turkey,” *Turk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3, No.2, 2022, pp.183–195.

③ Todd H. Hall, “Dispute Infl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7, No.4, 2021, pp.1136–116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治语言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学界围绕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对各国政策和行为的影响以及国际安全等具体领域进行了很多创新研究。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国际关系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变化也促使学界进行新的反思和探索，对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也同样如此。该领域近年来围绕战略叙事、话语、安全化、情感、科学技术等进行了很多新研究、新探索，不仅体现了国际政治语言学在时代浪潮冲击下推陈出新的努力，也拓宽了研究视角，丰富了研究议程，深化了原有的学理和政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技术因素的介入更是为深化研究带来了更多机遇。这些新发展为理解国际政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使人们对大变局下国际政治的诸多新变化产生了更多新理解和新认识，整体推动了国际政治语言学的新发展。这些新变化对如何深化对国际政治中语言的认知，如何利用好语言这一要素也具有理论和实践启示。当然，未来国际政治语言学在理论融合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揭示语言与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仍需要思考如何突破现有理论碎片化的局限，如何通过跨学科深度整合，构建更具解释力与预测性的综合理论体系。此外，国际政治中目前遍布大量虚假信息，如何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避免算法的偏差等都是在围绕具体语言的研究中需要应对的问题。同时，随着数智时代的发展，国际政治语言学还需要关注一些新兴议题，如网络空间的政治话语博弈、跨国社交媒体中的叙事传播、虚拟空间的政治语言现象、虚假信息治理等。而如何通过语言为充满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建构一个包容性的全球话语体系和话语环境，也是中国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需要长期思考的一个基础问题。未来，这些领域与研究视角需要学界持续关注。

收稿时间：2025年2月
（责任编辑：全楚利）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New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inguistics in China under the Great Changes of World Politics

Sun Jisheng

Abstract: Language is a crucial factor influencing world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late 1980s, with the linguis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guage entered the research agenda of world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itiat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tegrating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language, and the em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inguistics (IPL).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first on the ontological role of language in world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impact of language on state behavior and foreign policies. I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such as securitization, post-constructiv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etc. In recent years,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system is experiencing profound and complex transformation, global governance is faced with arduous tasks,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is intensifying,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caused by regional conflicts have again attracted world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Meanwhile,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the rise of Global South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rrative and discourses competition have emerged as a critical domain of world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se new changes have also highlighted the influence of narratives and the role of language, promoting new developments of IPL. Narratives and strategic narratives, and the impact of discours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sparked more research interest. Researches on securitization have been increasing, incorporating emotional dimensions into the research of securitization process.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new research area, such as its influence on new methodologies. Through the lens of language,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 new trend. These new developments and explorations have further enriched the research agenda of IPL.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continue to drive and deepen th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IPL, which will continue to help people better understand this fast-changing worl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inguistics; China School of IRT;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